

周显宝^①

试述古代中日音乐文化的人类学前提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比较研究了中日音乐文化深层背景中的一个侧面,对中日音乐文化的人类学前提作了历史的梳理,指出两国在古代不同历史阶段,音乐文化人类学前提的更新、发展对音乐文化模式的形成、发展所产生的直接影响。目的在于通过中日比较,挖掘其深层人文潜因,力争对中日音乐文化的同与异,有一个较全面、较深刻的认识,以利于更好地互相学习借鉴,繁荣发展当代音乐。

[关键词] 图腾 神灵 伦理 日本 文化人类学 前提 比较

[分类号] J607.0

在世界音乐文化的大花园中,中日两国的音乐文化之花各具魅力,齐放异彩。这固然与其自身不同的多姿风格、鲜明特点、丰富色彩等表面现象有关,同时也与其深层的、隐蔽的人文背景紧密相联。我们不妨从人类学入手,对中日音乐文化加以探讨、研究。

一、图腾崇拜一致

在音乐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音乐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或是对自然音响的模仿。这便与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有了联系。既然在人类之初,对某一种自然物、自然现象(其中包括自然音响)感到奇妙,进而模仿之、欣赏之、直至崇拜之,那么,久而久之,这种自然对象就成了一种可以顶礼膜拜的对象,即图腾(totem)。它实际上是一种图腾观念的象征物,有“标记”和“亲属”的含义。

“图腾”一词源于印第安方言土语“ototeman”,原始人认为某一种图腾与本氏族或本部落有血缘或其它较密切的联系,因而将其视为保护神,以它为本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和标记。氏族和部落都是由具有同一血缘关系的成员组成的社会群体,图腾是氏族成员亲缘关系的象征,氏族社会通过对图腾的崇拜、祭祀活动,维系氏族内部、部落群体的关系。这种对图腾的原始崇拜、祭祀,直接影响到原始社会文化艺术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人类学家对世界各地现存原始遗迹的挖掘考证,最后发现这种同某种自然对象相联系的“血缘关系”的原始崇拜、祭祀,并非仅仅北美印第安部落才有,而是对世界各地都有着普遍的人类学意义,比如中国和日本,就是如此。

7000年前左右的中国仰韶文化属于新石器文化。人类能够磨制石器、烧造彩陶,处

① 作者简介:周显宝,男,1964年生;文学硕士,厦门大学音乐系讲师(厦门 361005)

收稿日期:1997-10-05

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在一些出土的墓葬中,死者都有随葬品。约在同一时期的日本绳纹文化也属于新石器文化。人类能够制造新石器,烧制印有草绳花纹的陶器,这一时期日本出土的墓葬,则以石块、陶器为随葬品。这种现象表明,中日两国都相信,各种动物、植物、自然现象都有生命和灵魂存在——万物有灵,形成了一种对自然的崇拜,这种自然崇拜来源于中日两国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中国的仰韶彩陶上有许多小动物,甚至人头、动物身体的图象。日本的绳纹遗迹也有动物陶俑,这说明当时确实把一些动物当成了氏族的图腾,加以崇拜、敬奉,甚至认为人是由这些动物变来的,人的祖先和这些自然物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这就将自然与血缘神秘而巧妙地结合、统一起来了。

二、神灵崇拜与祖先崇拜合流

我们一向以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而骄傲、自豪。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一书中考证认为,龙的主体形象是蛇,这主要是因为,以蛇的图腾的部落很强大,统一兼并了其它氏族,于是就以蛇的图腾为主体,兼采其它氏族的图腾为某一部位,最后,人为地造出了龙的形象特征。比如马头、鹿角、兽足、狗爪、鱼鳞、鸟翅等等。《史记·五帝本纪》中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这说明古代神农氏族是以人身牛首的炎帝为祖宗神灵的。《诗经·含神雾》中说:“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古代伏羲氏族是以曾被描绘为人首蛇身的太 为祖先神灵的。这些祖先神祇已不是图腾崇拜时代的动物神祇,而是人兽同形、人神一体的神灵了。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中说:“昔日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之阴,取竹于 之谷,……次制十二筒,以之阮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同篇

还记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鹿冒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尚书·益稷》中记载,乐人夔说“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下管鼗鼓,……鸟兽跕跕;《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所谓“听凤凰之鸣”、“效山林溪谷之音”,无非是指音乐是对自然的模仿;所谓“鸟兽”、“百兽”、“凤凰”,往往多指氏族崇拜的图腾。“黄帝”、“尧帝”皆为我们祖先的代表,他们已被神化。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不仅反映出对自然的模拟、崇拜,还具有了效力帝神、尊宗敬祖的功能。音乐文化中折射出图腾、自然崇拜进一步人化,转变为祖先崇拜;进一步神化,转变为神灵崇拜,人即神,神即人,人神合一。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日本北九州古国邪马台国的女国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有日本学者考证,“卑弥呼”在日语中意即“太阳之子”,“事鬼道”指祭祀日神。卑弥呼将日神看做祖先之神,日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合而为一,利用“太阳之子”的名义,祭祀日神的仪式来迷惑众人,统治国民。北九州之外的其它古国,也有自己的神灵崇拜,因此,日神并未立即成为日本唯一的神灵崇拜。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话传说中,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后来才成为日本的主要崇拜之神,这一神话系统的形成过程与日本天皇逐渐兼并统一日本诸岛国,把太阳之神奉为唯一的祖先神灵的过程相伴随。6世纪中期,皇室根据各氏族的神话,进行综合、理事,编写了《帝纪》、《本辞》,天照大神正式成为皇室的祖先神灵。

从《古事记》、《日本书纪》、《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等文献记载中可知,这个时期的日本音乐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仿照演奏乐器的明器、出土的乐器等考古资料可资佐证。《古事记》中记载:“天钿女命系住天香山上天之日影,以天上的正木花作假发,将天香山的小竹叶结在舞扇上,在天之石屋门口复下大桶,踏着桶发出轰响。”这位天钿女命就是日本猿

女的祖先。这位祖先唱歌跳舞以取悦于天照大神,便是日本“神乐”的起始。另外,这些文献中的歌词,一般都押韵,在原则上是可以歌唱的。可见,日本这时的音乐文化也是既反映神灵崇拜,又体现祖先崇拜的。音乐是为了娱神悦人的,天照大神与天皇家相互依存,天皇既是神的化身,又是人的祖先代表。

三、伦理崇拜与血统崇拜分镔

经过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学说逐渐被中国的统治阶级重视和利用。中国儒学的“天命观”,实际上是一种“天人相通”、“天人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它还是来自于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上天和先帝是至高无上的。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类在不违背自然规律、不违背“天”的旨意,不违背上苍安排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合一”,达到最高境界。于是,儒教成为一种思想体系,成为一种人们生活的行为规范。它使得人们必须讲究一种上下、长幼、尊卑等的伦常关系、等级次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封闭式的封建等级观念和官僚制度。而在思想文化上则形成了一套封建伦理观念,孔子的礼乐思想特别受统治阶级的重视,它直接影响导致了以礼乐为中心的音乐文化体系的形成、发展。中国古代也因此较早以“礼乐之邦”著称于世。

早在商、周时期,我国音乐教育已初具规模。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国王、诸侯、公卿、大夫等贵族的子弟,教育的目的正如《周礼·地官》中所说:“以乐礼教和,而民不乖”。音乐教育中“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通过“乐”与“礼”的教化,达到“和谐”、“不乖”的目的。所谓“和”就是运用“乐”、“礼”来实现天人之和、人人之和、人心之和。

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所以修内,礼所以修外”,“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礼乐教育占据十分重要

的地位。孔子培养弟子的最高标准是要求学生身通六艺。所谓“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礼”与“乐”居于第一、二位。“礼乐”思想到了孔子这里,已发展成为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与灵魂。

《乐记》是一部总结了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其涉及音乐领域之广,令后人叹为观止。它论述了音乐的本质与特征,音乐与政治、伦理、社会、生活的关系,音乐审美、音乐教育、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的创作与表演以及乐律、乐器问题等。同时《乐记》也着重总结了西周以来“礼乐”治国的经验,而且还继承发扬了孔子的礼乐精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地下音乐殿堂的考古发现,那规模宏大、自成体系,以编钟编磬为主体的乐队排列、编制,充分说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丰厚的艺术实践基础之上的。

《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音乐产生于人的心灵,而人心又是受了外界自然的刺激,对自然的模仿、崇拜才是音乐产生的最根本原因。《乐记》中提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审乐以知政”,“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是维护“政”的法律、制度,“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即是指“乐”与“礼”相通。“乐”与“礼”协调配合,并行不悖,就会政通人和,上下顺畅。《乐记》中还指出:“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谐;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之所以能使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伦理纲常,和顺畅达,则主要因为这是“先王立乐”,这乐是“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的礼乐。儒家这种礼乐思想被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所供奉,得到了持久的巩固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特色,并各具时代特

点。这一音乐文化体系具有超稳定的内在结构力和超强度的外在同化力,因此在文化的历史变迁与外来文化接触中,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始终处于同化外来文化的态势,偶有局部的融化和涵化现象发生,但都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音乐文化的模式。

日本人巧妙地继承、运用了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日本人对太阳和祖先之神的崇拜,导致了“神皇一体”、“祭政一体”的政权形式出现,后来还演化为天皇家族“万世一系”。这实际上是一种“血统崇拜”,血统崇拜的顶点是天皇家族,尽管它不能直接统治国家,而它做为血统顶点的象征则成为日本思想文化的中心。这个中心小而紧密、团结坚定,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持久不变,被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加以崇拜、祭祀。但在实际生活中,尤其在与其它文化接触中,则表现为强大的吸收力和融合力。血统崇拜从开始的“纯而又纯”转变为“优化、进化”,不惜一切代价吸收其它异质的先进文化和优秀传统,以提高、加强自身。在日本的音乐文化发展史上,曾有过三次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改革运动:第一次是大化革新时期,吸收了中国隋唐礼乐文化;第二次是明治维新时期,吸收了以德奥为主体的西欧专业音乐文化。第三次是二战之后,接受了美国的音乐文化。

公元5世纪,中国儒学传入日本,日本人便逐步系统地学习吸收中国儒家典籍和思想。到了江户时代,儒学在日本达到全盛时期,并逐步日本化,甚至在日本社会思潮中成为主流。儒家思想在孕育了日本人“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血统崇拜思想的同时,也给日本人灌输了“华夷”论的“中国中心论”思想。日本在历史上被中国称为“东夷”,特别是到了近代,日本民族内心深处对此开始有一种“劣等民族”的失落情绪。作为对这种失落感的平衡补偿,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家们竭力搜寻日本与中国同属“君子国”的历史理论根据。熊泽藩山就曾主张“泰伯渡来说”,认为

日本人祖先是周朝贤人泰伯的后代,推而论之,日本也是礼义之邦,礼乐之邦。山鹿素行认为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国内和平,国外无争,颇讲礼义,理应与中国同属华夏。本居宣长则说,天照大御神就是普照世界的太阳的意思,日本拥有这样的神,理该是万国之源的中心国。天皇是天照大御神的后代。会则安则说,天皇是太阳之子降临日本,象太阳普照全球,博爱世界,具有“使四海为家”,使“皇国”光辉“照临四海万国”的义务。而在实际的文化生活中,太阳之子的纯正血统,又是可以优化、进化的。谁最先进、最强大,他就向谁学习,吸收其长处,以提高自己,优化血统。

《后汉书·东夷传》载,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赐“汉委奴国王”金印,据考证“委奴国”即:“倭奴国”,此印于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日本考古学家在山阴、北陆等地发现日本铜铎,这是模仿中国古代编钟而造的,且有发展,铎身的图案花纹具有日本民族风格。南朝陈文帝天嘉三年(公元562年),日本侵略高丽时,带回“吴人”及乐器等,“吴人”就是中国人。到了隋唐时代,日本人认识到中国先进的音乐文化远远高于日本,只有向中国学习,才不会落后、被动。隋代,日本先后四次派出遣隋使来我国考察学习,第一次是在公元600年。唐代,日本先后向我国派出大批遣唐使,如果从公元600年算起,至公元838年最后一批,在这250年间里,共派出22次之多,人数之众,举世罕见。这些日本人,绝大部分是留学生和僧人,来中国了解、学习中国文化,其中有很多人专门学习音乐、或兼学音乐。公元717年来华留学生吉备真备,于公元735年回国,带《乐书要录》十卷、铜律管、方响等乐器回日本。公元805年学问僧最澄、义空带各种中国乐器回国。公元835年,日本遣唐使藤原贞敏来中国,先后向长安的刘二郎、扬州的廉十郎学习琵琶,公元839年回日时带去了数十卷乐谱。藤原回国后,还在日本朝廷提任官职

“雅乐助”。他们将唐乐带回日本,学习借鉴,为已所用,将唐乐日本化,创作出了日本自己的宫廷音乐——“雅乐”,对日本中世纪音乐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对唐代中国传入的音乐理论书籍、乐谱及多种乐器等十分珍视,很多一直保存到今天。从日本推古天皇中期至平安朝末期(约公元600年—公元1190年)的五六百年间,日本上流社会大量学习、模仿唐乐,蔚然成风,完全影响、改变、同化了固有的日本传统音乐,产生了日本传统音乐与中国唐乐相结合的杂交新乐种。因此,早在古代的日本音乐文化深受中国礼乐文化的高位同化,近代又与欧洲专业音乐文化融合,日本真正的传统音乐成为象天皇一样的象征物,被深藏在博物馆之中或散落民间,而经过外来文化的调整、整合之后,第三种新的文化体系诞生。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日两国音乐文化的人类学前提都是从自然、图腾崇拜开始的。对自然的崇拜和模仿,是音乐起源的发端。随着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神格化和人格化,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取代了对自然和图腾的膜拜。而且这两种崇拜结合,人与自然合一、人与神一体,神灵崇拜与祖先崇拜合流。反映在音乐文化上,则表现为:对神灵的祭祀作乐和帝王的功成作乐;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从原始社会逐渐步入阶级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人的意识形态进化,人的信仰开始从对神灵与祖先的崇拜演进、分化为对伦常秩序和血统关系的关注和敬仰,中国的伦理崇拜与日本的血统崇拜分镳。在中国,伦理至上,将神灵、祖先崇拜物化、扩大为一种社会关系和制度,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在日本,血统崇拜将祖、神崇拜演化、缩小为一个天皇家族世系,成为一种观念和象征。

随着人类学前提的更新、发展,中国音乐文化自成一体,具有强大的自构能力和同化他文化的整合能力。而日本的音乐文化他成

一体,广采博纳异质文化因素,吸收、采借、融合、涵化了多元音乐文化成分,新的音乐文化体系不断演变、更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传统音乐被束之高阁、藏之深闺。如果用图式来总结本文对中日音乐文化人类学前提的表述,即是:

图腾崇拜(中、日双方基本一致)

|

神灵崇拜与祖先崇拜合流(中、日双方大同小异)

^

中国伦理崇拜 日本血统崇拜
(中、日双方开始分镳)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国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8月第1版。
2.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3月第1版。
3.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出版,1991年2月第2版。
4. 盛邦和:《透视日本人》,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第1版。
5. [日]山根银二:《日本的音乐》,丰子恺译,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1961年10月第1版。
6. [日]星旭:《日本音乐简史》,李春光译,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1986年2月第1版。
7.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1989年12月第1版。
8. 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1994年4月第1版。
9. 陈舜臣:《日本人和中国人》,邱岭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990年6月第1版。
10. 王勇 [日]上原昭一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艺术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12月第1版。
11. 周畅:《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和”的观念》,载于《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
12. 陈炎:《儒家文化的人类学前提与社会学背景》,载《齐鲁学刊》1996年第2期。
13. 谢建明:《儒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及其整合》,载《东南文化》1996年第2期。
14. 周显宝:《比较中外神话传说,看音乐与自然之关系》,载《中华乐志》(台湾)1995年第6期。
15. 周显宝:《日本明治时期的改革与中国清末民初的改良——中日音乐教育比较研究》,载于《中国音乐学》1996年第2期。

责任编辑 孙晓晖